

透视中国

邓聿文

作者 邓聿文是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原副
编审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2期
2026年04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从“打天下”到“守 成一代”：中共元 老政治的结构性衰 落及其当代意义

摘要：在毛泽东去世后的二十年间，元老政治在中共最高权力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以邓小平、陈云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党国元勋依托革命功绩、军队控制、人事网络和历史叙事权，对最高决策层施加“裁决性影响”。然而，这种合法性是不可再生的，随着第一代元老的凋零、资历断层的出现，以及制度集中化和个人集权化的推进，元老政治的影响力逐步衰退，并在习近平时代基本被架空。通过历史回溯与结构分析，本文将构建“元老权威衰减时间轴”，揭示元老政治衰落的制度逻辑与历史必然性，并从结构上分析当代“元老反习”传言的不可能性。元老政治终结意味着习近平极权体制内部非制度化制衡机制消失，权力高度集中化虽提高了决策效率，但亦增加了政策失误难以纠偏的风险。这一转变不仅是中共政治史的重要节点，也是专制体制演变的重要案例。

在近年的中国政治流言中，“元老”常常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出现在公众叙事里。每逢中共进入关键政治节点——无论是2018年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还是2022年二十大的人事布局，抑或2025年的中共四中全会——坊间总会流传出类似的版本：某位退休常委在内部会议上直言批评习近平，或是在北戴河会议上与现任最高领导人激烈交锋。这类故事的细节往往难以证实，却能迅速在舆论场获得广泛传播，甚至被部分境外媒体引用，成为观察中国政治动向的“暗线”之一。

然而，一个基本的问题很少被认真追问：这些所谓的“元老反习”情节，在当代中共的权力结构中真的可能发生吗？或者说，今天的“元老”是否还具备足以对最高领导人形成实质性约束的权力资源与政治合法性？

要回答这些问题，不能仅停留在政治传言的真假之辩上，还须回到历史与结构本身——厘清“元老”在中共语境中的定义，追溯其权威的合法性来源，并考察这种权威如何在制度演变与代际更替中逐步衰减直至近乎消失。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分析元老政治从“打天下”一代的巅峰到“守成”一代的式微轨迹，揭示当下“元老反习”传言为何多是政治想象，而非现实可能。

本文的研究将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

1. “元老”的概念与结构在中共政治体系中是如何形成的？
2. 元老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何在？这种合法性为何具有不可再生性？
3. 元老政治在制度集中化与个人集权化趋势中经历了怎样的衰落过程？

研究方法上，本文将结合中共官方文件、领导人文集、会议记录等一手材料，并辅以国内外权威学术研究与可靠新闻资料，通过历史追溯与结构分析，呈现元老政治的兴衰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制作一份“元老权威衰减时间轴”，以直观展示 1978 年至今元老政治的变化轨迹。

元老政治的历史起点与结构特征

在中共政治语境中，“元老”并非正式职务称谓，而是一种带有非制度化色彩的政治身份，通常指那些已经退出一线领导岗位，但在党内仍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老一辈高级干部。这种影响力主要来自他们的

革命资历、历史功绩、军政人脉以及相对于现任领导人的历史地位优势。与西方政治学中“长老政治”（elder politics）的概念相比，中共的元老政治更强调革命功绩所赋予的政治合法性，与此同时，它又深嵌于威权体系内部的非正式关系网络 and 实际权力运作之中¹。然而，这种政治形态并非贯穿中共历史始终。毛泽东时代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元老政治”，因为毛本人就是最大的元老，也是党内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威。毛不仅在形式上是党的领袖，更在实质上垄断了路线制定、干部任免和意识形态解释权。即便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资历深厚的领导人，在毛的个人权力面前也无法形成独立的元勋集团，更遑论在关键政治决策上制衡毛。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老干部被打倒，政治生命几近中断，毛对他们的复出有绝对的决定权，这种单一化的权力格局决定了元老政治在当时无从存在。毛晚年虽在现实治理压力下恢复了部分老同志的职务（如1973年让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整顿），但这更像是临时调度，而非制度化的权力分享。

真正意义上的“元老政治”是在毛去世后的权力真空中形成的。1976年毛泽东逝世，华国锋以“英明领袖”姿态接班，但很快受到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功勋制衡。这批人几乎都经历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关键历史阶段，在党政军各领域担任过核心职务，政治资历远高于华国锋等“中生代”领导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军队系统中保有直接或间接的人脉与威望，使他们能够在没有一线职务的情况下，对国家重大决策施加实质性影响²。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在这批元老集体推动下，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党内正常生活的路线转折。这标志着元老政治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其核心运作逻辑是：退居二线的开国元勋依靠革命功绩和网络化权力，对中央最高决策层施加“裁决性影响”，而现任领导人则在相当程度上，必须与他们保持政治协商甚至依赖关系。

这一时期的元老政治具有鲜明的结构特征。首先，它是非制度化的，党章和宪法并未赋予他们明确的权力来源，但他们依靠个人威望、历史地位和控制的人脉网络介入决策。在1982年通过的新《党章》中，虽然设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中顾委）作为安置老同志的正式机构，但其实际功能远超“荣誉职位”，成为元老影响政治的重要平台。其次，这种威望型合法性与政权合法性高度绑定，开国元勋的个人政治生命与共和国的政治基础息息相关，使他们拥有天然的“裁决”正当性。例如，邓小平虽然在1980年代多次拒绝担任国家主席或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在废立总书记、拍板重大改革政策、处理“六四”危机等事件上拥有最终决定权³。最后，元老政治是高度网络化的，他们通过在党、政、军不同领域培植的干部体系，形成纵深影响力，能够跨越正式的组织边界对最高领导层施加决定性压力。军队系统尤其是他们的重要权力支点，例如叶剑英在1976年的“粉碎四人帮”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直接改变了政治格局；邓小平则在1980年代通过军委主席身份稳固了对军队的控制权。

1978年至1992年可视为元老政治的巅峰时期。在此期间，第一代元老不仅塑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框架，还在最高领导人更迭、重大政策调整乃至危机处置中发挥了裁决作用。但这一结构的内在脆弱性也已显现：其权威的根基——革命功绩与“打天下”的资历——是不可再生的。一旦第一代元老自然凋零，接班的“守成一代”在历史

合法性上将难以与他们比肩，这为后续元老政治的必然衰落埋下了伏笔。

元老权威的合法性来源

元老政治之所以在毛泽东去世后能迅速成型，并在 1978 年至 1992 年间达到巅峰，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掌握着一种多维度的合法性资源。这种合法性不仅来自个人的革命履历和历史功绩，还深植于中共政治文化与制度安排的深层结构之中。与现代民主政体中权力合法性主要依赖选举授权不同，中共的权力合法性更多依托于历史叙事、革命传统与组织认可的结合，而第一代元老几乎在这三方面都占据绝对优势。

首先，革命功绩是元老权威最直接、也是最不可替代的来源。作为党和国家的开国功臣，他们亲历了中共全部的“合法性建构史”——从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到长征的生死考验，再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折，直至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这些经历不仅构成了个人政治资本，也塑造了中共官方叙事中的“英雄史观”。在这种叙事体系中，革命元勋不仅是政权的奠基者，更是制度的天然守护者⁴。这种身份赋予他们在党内外一种类似“宪制监护人”的地位，即便没有任何职务，也被视为有资格对重大路线方针做出最终裁决。

其次，军队控制权是支撑元老政治的核心支柱。在中共的权力结构中，军队不仅是国防力量，更是政治权威的保障。邓小平、叶剑英、杨尚昆等人退居二线后，依然掌握或影响着中央军委的关键职位安排，对各大军区主官的任免有直接发言权。这种军事影响力不仅在权力斗争

中发挥过决定性作用，也在日常政治中为元老的意见增加了分量。对现任领导人而言，忽视或公开挑战这些掌握军权背景的元老，无异于触碰政治安全底线。

再次，人事与组织网络构成了元老在制度层面延续影响的渠道。中共的干部管理体制长期强调“上级提拔、下级服从”，在这种体系中，元老在任时提拔的大批地方与部委干部，构成了他们退居二线后在组织系统中的“代理人”网络。这些干部既是元老政治意志的延伸，也是元老在政治协商中可以动员的现实力量。例如，1980年代初期，陈云凭借其在财经系统中的权威，影响财政、银行等经济部门的政策走向，而邓小平则通过在中央军委与组织部的影响力，确保改革派在关键领域占据主导。

此外，话语权与历史叙事的塑造能力，使元老能够在意识形态层面对现任领导人形成压力。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历史的解释权，而第一代元老既是历史的亲历者，又掌握了对历史叙述的最终定调权。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便是由邓小平、陈云等元老主导的历史评价工程⁵，其内容不仅为改革开放确立了思想基础，也为他们在政治上继续掌握主动权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当某一政策路线与他们所确立的历史基调发生冲突时，他们便有理由以“维护历史结论”为名进行干预。

最后，政治文化中的长幼尊卑观念与“功勋政治”传统，为元老权威提供了软性但稳固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中共党内，资历不仅是政治资本，更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正当性来源。第一代元老的资历差距与中

生代领导人相比往往有十年至二十年以上，他们的经历和威望被视作党内不可轻易挑战的道德权威。这种文化心理不仅约束着现任领导人的行为，也影响着党内舆论的走向。

正是上述多重因素的结合，使第一代元老在毛去世后的十余年里，既能在关键时刻直接干预最高领导人的去留（如1987年和1989年的废立总书记），又能在日常政治中通过军队、人事和话语权塑造政策方向。然而，这种合法性结构具有天然的不可再生性——革命功绩不会复制，军队人脉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断裂，人事网络会因代际更替而消散，历史叙事权也会被新一代领导人逐步接管。这种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元老政治的巅峰只能属于“打天下”的第一代，而在随后的代际交替中必然走向衰落。

元老权威的衰落轨迹

元老政治的形成与巅峰依赖于第一代开国功勋的独特历史条件，而这种条件在代际更替中不可避免地流失。自1978年至今，元老权威经历了从巅峰到边缘化的渐进衰落过程，其背后的推动力，既有自然代谢和资历断层等客观因素，也有制度集中化与个人集权化等主观设计。这个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特征、权力基础与衰减原因都呈现出明显差异。

第一阶段（1978-1992），可称为巅峰期，以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薄一波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元老依靠革命功绩、军队控制、人事网络和历史叙事权，牢牢把握对最高决策的裁决权。这一时期，元老不

仅能在重大路线问题上定向（如确立改革开放），还可以在政治危机中直接废立最高领导人（1980年胡耀邦上任，1987年胡耀邦下台，1989年赵紫阳被免职）。邓小平虽不担任总书记或国家主席，却能凭借军委主席和最高威望地位主导党和国家方向。这是元老政治的绝对巅峰。

第二阶段（1993–2002），可称为余威期，随着邓、陈、叶等人相继去世，第一代元老的影响力虽然衰减，但薄一波、万里等老一代革命元勋的余威还在。与此同时，姚依林、宋平等做过政治局常委的老同志接过“退休影响力”的位置，他们已不再具有“打天下”一代那种革命合法性，虽仍能对高层人事安排和政策方向施加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协商、建议和幕后运作，而非邓小平时代那种拥有最终裁决权的元老政治。特别是这一时期，中共中央通过1992年废止中顾委，将老同志影响制度化的平台取消，标志着元老政治的制度性弱化开始。

第三阶段（2003–2012），可称为延续影响期，这一时期，传统意义上的第一代革命元老已基本退出政治舞台，但以江泽民为代表的“新元老”，在退位后对胡锦涛时期乃至习近平前期的高层人事和政治运作仍保持了相当影响力⁶。与此同时，宋平等老干部仍保有一定象征性权威。与邓小平时代相比，这种影响已不再建立在革命功绩和最高裁决权之上，而更多依赖退休最高领导人的资历余威、派系纽带和人事残余，例如所谓江派。它仍能影响高层权力分配，却已难以公开、直接地决定最高政治路线。

第四阶段（2013 年至今），可称为“边缘与象征化时期”。习近平上台后前两年，人事和政策还受到退休元老的干扰，但他通过反腐运动、政治整肃、军队改革和组织权力上收，大幅压缩了他们影响政治的空间⁷。军队系统整编切断了既有军事人脉，干部任免高度集中于核心手中，舆论与意识形态控制也使老同志公开发声几乎失去现实渠道。在这一格局下，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等退休高层在现实权力结构中已明显边缘化，其政治功能主要限于礼仪性出席重大活动和象征性存在。所谓“元老反习”的传言，更多是对历史经验的想象性投射，而非现实政治的再现。

为了更清晰地呈现这一衰减过程，可以用下表概括：

阶段	时间	主要元老	合法性来源	权力特征	衰减因素
巅峰期	1978-1992	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薄一波等	革命功绩 + 军队控制 + 人事网络 + 历史叙事权	可直接废立最高领导人，裁决路线	第一代元老自然凋零；合法性不可再生
余威期	1993-2002	薄一波、万里等仍具影响力的老一代革命干部，姚依林、宋平等	革命资历余威 + 人事网络延续	对高层人事与政策方向仍有一定影响，但已难形成邓时代那种最终裁决权	中顾委废止；革命功绩断层
边缘化期	2003-2012	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等	任内资历 + 派系纽带	仍能影响高层人事与权力分配，但已难直接裁决最高路线	资历差距缩小；军权与组织权更集中于现任；退休高层逐步收缩
象征化期	2013- 至今	江泽民（去世前）、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等	任内资历	在现实权力结构中已边缘化，主要表现为礼仪性出席与象征性存在	高度个人化集权；军改切断军事人脉；反腐清洗派系；舆论封锁

这一时间轴不仅反映了元老政治的历史起伏，更揭示了其衰落的制度

性逻辑——革命功绩一旦成为历史，元老的合法性基础便难以为继；而在高度集中化的权力结构中，所有非现任的政治权威都被制度化地边缘化。这一演变过程，使得当代中国政治中元老的作用与 1970-1980 年代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元老政治衰落的关键因素

元老政治的衰落并非单一原因所致，而是由一系列结构性与政策性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这一过程在邓小平晚年便已显现，并在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代领导人的制度与人事安排中逐步完成。其根本逻辑在于，元老权威的基础——革命功绩、军队控制、人事网络、历史叙事权——随着时间推移自然削弱，同时受到制度性设计的主动切割，最终被纳入高度个人化集权格局中的安全控制范围。

首先，最直接的因素是**合法性断层**。第一代元老的革命功绩与党和国家的合法性相捆绑，他们在党内的地位具有“创制性”与“裁决性”，任何现任领导人都难以公开否定。然而，第二代及以后的元老缺乏这种革命资历，他们的政治资本更多来自在任期间的行政业绩与政策成就，这类成就本身容易受到后任的调整甚至否定。在政治文化上，守成一代的元老虽有资历，却缺乏“打天下”一代天然的历史光环，从而失去了在路线分歧时“压阵”的正当性。这种断层是不可逆的，一旦革命功绩不再是现实政治资源，元老干预政治的合法性便随之消散。

其次，**制度集中化**是有意压缩元老权力空间的关键步骤。1992 年中顾委的废止，标志着元老政治失去了一个半制度化的集体平台。尽管

设立中顾委的初衷是为老同志“退而不休”提供名誉性安排，但在实际运作中，它成了元老集体发声与协调意见的重要渠道。废止该机构，一方面符合干部年轻化的制度趋势，另一方面也切断了元老集体性干预政治的制度通道。此后，元老的政治影响更多依赖个人威望与私人关系，而非集体运作，这大大削弱了其组织化的政治力量。

第三，**军队系统的整编与权力上收**从根本上切断了老老的军事支点。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部分元老仍能通过自己提拔的将领或在军委的旧部间接影响军队。然而，习近平上台后展开的大规模军改——包括裁撤四总部、成立联合作战指挥机构、调整战区结构、严厉清洗高层将领⁸——不仅完成了对军队的再集中化，还有效清除了与退休高层有深厚渊源的军事人脉。军队在组织上和政治上都更加直接依附于现任核心，成为其个人权力的保障，而不再是元老影响政治的潜在工具。

第四，**反腐运动与人事再布局**削弱了元老的人事网络。在中共体制中，人事影响是元老退居二线后延续政治作用的主要手段之一。然而，自2013年以来的反腐风暴，特别是在军队、石油、金融、宣传等关键系统的大案，直接瓦解了不少退休高层的旧部与亲信网络。这不仅清除了潜在的派系威胁，也阻断了元老通过“干部提携链”向现任施压的可能。加之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办公厅对干部任免的高度垄断，任何涉及副省部级以上的任命都需要核心亲自批准，老老的推荐与干预几乎没有实际空间。

第五，**舆论与信息控制的强化**，使元老失去了塑造党内议程的公开渠

道。第一代元老时代，党内文件和内部讲话往往能在有限范围内形成政策压力，部分甚至会被有意泄露到媒体，引发舆论波动。然而，当前的舆论控制机制——包括对内部文件流通的严格限制、对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实时监控——使得元老即便在内部提出不同意见，也极难形成超出小范围的政治影响。对少数公开撰文或讲话的老干部，相关内容通常在短时间内被删除或封锁，其象征性影响远大于实质性效果。

最后，**政治安全化管理**巩固了对元老的全面监控。在现行体制下，退休的高级领导人享有高规格的生活待遇与警卫保障，但这些“礼遇”与严密的安全管控是捆绑的：日常出行、会见、通信都在安全部门的监控之下，政治性聚会受到严格审批。这种安排既防止了元老成为在任领导人的潜在政治对手，也避免了他们成为不同派系整合资源的节点。尽管如此，在江胡时期，由于那时党内政治生态相对宽松，退休领导人的活动和出行，尤其离京行程，虽也受限，但未必被严格束缚。而在习近平时代，对退休领导人的监控被纳入对习本人是否忠诚的一环，这就使得此种监控尤为强化，元老们几乎完全丧失了串联谋划的可能，如果他们想串联的话。

综上，元老政治的衰落是历史条件与制度安排双重作用的产物。历史条件的变化使元老失去了革命功绩和军队控制等核心资源，而制度集中化、军改、反腐、舆论控制与政治安全化管理，则在结构上切断了他们可能重新积累影响力的路径。这一过程在习近平时代达到终点，元老的政治功能基本象征化，其在现实政治中的分量已与毛泽东去世后的二十年不可同日而语。

当代“元老反习”传言解析

在习近平执政的十余年间，关于“元老反习”的传言几乎定期出现，并且往往与关键政治节点同步：2018年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2022年二十大人事布局、在经济和外交出现明显压力的特定时刻，舆论场中总会流传某位退休常委或已故元老“在内部讲话中批评习近平”或“在北戴河会议上与核心发生激烈冲突”等情节。这些传言的细节版本各异，但通常具有几个共性：一是情节戏剧化，二是信息来源模糊，三是几乎无法得到公开佐证。然而，它们却能够迅速获得传播，并被部分境外媒体引用，成为观察中国政治动向的“隐秘信号”。

要解释这些传言的盛行，需要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它们的心理与政治市场，二是它们与现实结构的落差。从心理层面看，中国政治高度封闭，外界对最高领导层内部的决策过程几乎一无所知，这为谣言的生成提供了天然土壤。在缺乏透明信息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用熟悉的历史模板来推测当下的政治过程，而毛泽东去世后的元老干政经验，尤其是邓小平废立总书记的先例，正是最易被套用的模板。对于部分受众而言，想象现任领导人与元老之间的冲突，既符合他们对权力制衡的期待，也提供了一种解释政治变化的叙事便利。

然而，从现实结构来看，这类传言成立的可能性极低。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元老政治的核心资源——革命功绩、军队控制、人事网络、历史叙事权——在习近平时代已全部削弱甚至被制度性切断。今天的退休常委和前国家领导人，与1978-1992年第一代元老相比，存在几个本质差异。其一，他们在资历与威望上无法与“打天下”一代比

肩，缺乏天然的历史裁决正当性，即使对现任路线有异议，也难以在党内形成足以左右大局的反对意见。其二，他们不再掌握任何军队指挥权或干部任免权，即使存在私人交情，也缺乏动员成规模政治资源的能力。其三，他们的公开发声渠道被严格限制，任何可能引发政治影响的讲话或文章，几乎在短时间内会被信息控制机制封锁，难以形成持续的议程影响。

以“北戴河休假”为例，外界普遍将其想象为“元老与现任领导层博弈的平台”。事实上，近年来北戴河休假的议程和参与方式已发生显著变化，更多是由在任领导人听取部分专家和退休干部的政策建议，而非过去那种涉及最高人事与路线的闭门权力交易。即便有元老在此类场合提出不同意见，其内容也多停留在政策建议层面，不具备改变决策方向的制度条件。

因此，当代“元老反习”传言更多是一种政治想象的延续，是将历史经验投射到当下政治的一种叙事惯性。在信息极度不透明的体制中，这类传言不仅为舆论提供了谈资，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外界对权力内部存在制衡的心理需求。然而，从权力结构的现实出发，这些传言缺乏成立的必要条件。即便个别元老在私人场合表达过对现任政策的不满，这种不满也难以组织化，更无法通过制度化渠道对最高领导人形成实质性制约。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一现象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公众与外界观察者在缺乏透明信息的情况下，如何借助历史记忆和政治符号来建构对当前权力格局的理解；另一方面，它也恰恰印证了元老

政治在当代中国的衰落——当元老不再具备现实影响力时，他们在舆论叙事中的存在感反而可能被放大，因为这种虚构的存在感成为填补信息真空的一种方式。这种“符号性元老政治”与邓小平时代的实质性元老政治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进一步凸显了制度集中化和个人集权化对权力结构的深刻改造。

结论与理论意义

回顾 1978 年以来中共元老政治的兴衰，可以看到这一政治形态与特定的历史条件、权力资源和制度安排紧密相连。第一代元老依托革命功绩、军队控制、人事网络和历史叙事权，在毛泽东去世后的权力真空中迅速确立了超越正式职务的政治权威，并在近十五年的时间里发挥着对最高领导人和重大路线的裁决作用。然而，这种权威的根本上是不可再生的：革命功绩无法复制，资历差距会随着代际更替而缩小，军队与组织网络会因制度改革和人事更迭而瓦解。

从第二代元老开始，这种合法性和影响力便呈现出结构性衰退，虽然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人事布局，但已无法像邓小平时代那样直接干预最高领导人的去留。进入习近平时代，制度集中化、军队彻底整编、反腐运动对派系网络的清理，以及舆论与信息的全方位控制，使元老政治的功能基本被压缩到礼仪性象征层面。在这种格局下，当代“元老反习”传言虽在舆论场中频繁出现，却缺乏现实发生的制度条件与资源基础，更多是一种基于历史记忆的政治想象。

这一历史轨迹不仅是中共政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更广泛的政

治学意义。首先，它验证了威权体制中非制度化权力形态的脆弱性。当其合法性依赖于不可再生的历史资源时，衰落是时间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其次，它揭示了制度设计与个人权力集中如何在威权体制中塑造权力分布的边界，特别是通过制度性手段，切断潜在的非在任权力来源，确保最高领导人的不受制约。最后，它也提示研究者，政治符号与政治现实之间存在显著落差：即便元老在现实权力结构中已被边缘化，他们在舆论叙事中的象征性角色仍然可能被放大，并在政治想象中扮演超出其现实作用的角色。

因此，对当代中国政治的观察不能简单地套用邓小平时代的元老政治模板，而应基于对当前制度和权力结构的具体分析。在习近平时代，元老政治的终结不仅意味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更意味着极权体制内部制衡机制的进一步弱化。在缺乏制度化的集体领导与内部监督的情况下，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集中化，既提升了决策效率，也增加了决策失误并难以被纠正的风险。这一转变的政治后果，可能在未来的重大政策选择与权力交接过程中得到集中体现。

注释

- 1 参见尹钦“当代中国政治中‘领导核心’制之研究”，载《二十一世纪》2020年4月号，总第178期。
- 2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该书收录邓小平在改革初期围绕拨乱反正、经济调整、干部路线、外交和军队等重大问题的讲话。
- 3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该卷所收邓小平关于改革方向、中央领导层调整及1989年政治风波处置的讲话与谈话。他虽不居于最高正式职务，仍在重大政治决策中发挥最终裁决性的作用。另参见尹钦的“当代中国政治中‘领导核心’制之研究”相关论述。

- 4 参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81年6月28日。该决议从中共官方层面对党的历史作出重新评价，为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合法性重建提供了重要依据。
- 5 参见陈雪薇“陈云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的调整”，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2013年9月5日，<https://www.dswxyjy.org.cn/n1/2019/0228/c423964-30914912.html>。
- 5 参见曲青山“两个‘历史决议’的制定背景、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党建杂志，2021年11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的台前幕后》，党史博采，2009年4月。
- 6 参见本人所著《不合时宜的人民领袖：习近平研究》一书的相关论述，第31-33, 46-53, 79-80页，台北，独立作家，2023年出版。书中对江泽民退位后仍影响胡锦涛时期高层政治，并对习近平上台初期权力格局形成延续性影响，以及习开展的反腐运动、政治整肃、军队改革和组织权力上收，都有较具体讨论。
- 8 同上。
- 8 参见新华社报道“习主席和中央军委运筹设计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纪实”，人民日报2015年12月31日06版。